



流动的经典

——对柳青及《创业史》接受史的考察

张 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潍坊学院2011年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1BS14

流动的经典

——对柳青及《创业史》接受史的考察

张 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经典：对柳青及《创业史》接受史的考察/
张军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6
ISBN 978-7-209-06558-0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5565 号

责任编辑：李楠

封面设计：张丽娜

流动的经典

——对柳青及《创业史》接受史的考察
张军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开(155mm×230mm)

印张 16.5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

ISBN 978-7-209-06558-0

定价 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634)6216033

目 录

005	引 言
009	第一章 《创业史》经典化历程
010	一、经典的摇篮：《创业史》的出版
019	二、经典的宣告：第三次文代会上
023	三、经典的推广：批评家、座谈会与读者来信
028	四、经典的固化：载于文学史的荣誉
032	五、经典的捍卫：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之间的“竞争”
039	小 结
041	第二章 经典形成的原因
042	一、深刻的“重大主题”
046	二、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
059	三、“史诗”文学的典范
065	四、柳青的政治人格魅力
070	小 结
072	第三章 《创业史》的再评价
073	一、批判“文革”、缅怀柳青

080		二、《创业史》“再评价”
099		三、回归“十七年”的文学研究传统
108		小 结
112		第四章 “重写文学史”中的《创业史》
112		一、新时期与新思想
120		二、“新刊物”与年轻人
132		三、《创业史》成为“当头炮”
146		四、稳健研究的继续
150		小 结
152		第五章 “再解读”中的柳青和《创业史》
154		一、传统问题的新阐释
175		二、“新左派”视野中的《创业史》
186		三、比较研究的发展
205		四、研究的研究
209		小 结

216	第六章 柳青及《创业史》的符号化
216	一、路遥和陈忠实眼中的柳青
221	二、柳青文学研究的体制化
228	三、柳青成为文化符号的推动力
232	小 结
235	第七章 他者的柳青研究
235	一、柳青作品的翻译
238	二、忽略与批评
245	三、正视与理解
252	小 结
254	结 语
258	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在浩瀚辽远的文学史长河中，作家如天空中的星星一样繁多，有的似耀眼的北斗星，发出的光芒是那样的耀眼夺目、璀璨闪烁、永恒烂漫，让凡夫俗子产生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敬仰膜拜之情；有的像流星一样倏地划过无际的苍穹，绚丽的光束惊醒了漫漫长夜，如此的凄美艳丽短暂却又永恒；有的只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存在，这种存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无情的时间之流摧枯拉朽、裹沙带泥的变动中，它们被忘却、被淘洗、被丢弃。哪一个作家不想用尽他们的毕生精力来完成一部传于后世，藏之于名山的精品杰作呢？哪一个作家不想成为文学史上难以忘怀的大家呢？但是，时间的检验与评判只会留下经典之作让人们去阅读、记忆、传诵，人们也只会记住创作经典的那些大家、名家。

“经典”这个词分开来看，“经”在古汉语中指的是织布机上的纵线，与“纬”相对，引申为南北方向或南北向的道路、直行、法则、规范。“典”原意为常道、法则，后引申为可作为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经典”合起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

为：“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3. 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在《辞源》中，被解释为“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辞海》解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

中文的“经典”一词与英文的“Canon”一词类似，英文Canon的中译很多，其中包括：“经典”、“典律”、“正典”及“规范”等等。英语中的“Canon”一词的起源和条例及法律有关。罗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指出，“Canon”源自古希腊文Κάνα (kanna)，意即芦秆（Reed）及直杆、横木、直尺、芦秆、规则、标准、模范、严格的批评家、量度公制、占星图、极限、边界及税务评定；拉丁文“Canon”一词意思和希腊文相近，意谓条例及法律和指定文本的结合。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学评论家把“Canon”用在修辞学上，指一些完美无暇的文体及文章规范，和近代“Classic”一词意思相近。^[1]

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经典”又被译为“古典”，在早先的意义上，“所谓经典作品是指这些作品属于最优秀

[1] 陈硕：《经典制造——金庸研究的文化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的著作之列”^[2]。罗杰·福勒认为“在今天‘一部经典’很可能指地位得到公认的作品，常常不带赞誉捧场之意。”^[3]

以上关于“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从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的优秀品质方面来出发的，而佛克马、蚁布思认为“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或者用一种更为时髦的说法就是，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4]。这说明，经典更多的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著作，它不仅引发问题，而且常常引出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并提供答案，并且在道德原则上可以让人们“学到或多或少得体一些的道德成规、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魅力的行为方式，经典应该提供可供选择的行为典范，使文学获得生命的正是其中所阐发的道德和美

[2] [荷兰]阿诺德：《诗歌研究》，转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3] [英]罗杰·福勒著，袁德成等译：《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4] [荷兰]佛克马，[荷兰]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学价值”^[5]。

而本书将讨论的是，不同时代的经典具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每一时代的经典都折射出时代的投影，探照经典背后权力话语的运作程式将有利于对经典之作进行更深刻的意义发掘。而描摹经典流变过程中的接受嬗替，也可对其多层意蕴与内在功能进行全方位建构。柳青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一直被认为是十七年文学中的扛鼎之作、经典巨著，我们正可以此作为一典型标本，对其“经典之路”予以考察，来看看“经典”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又是如何发生流变、为什么会有这种流变等等问题。这样或许会帮助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予以反思，而当代文学的研究也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参考。

[5] [荷兰]佛克马，[荷兰]奴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第一章 | 《创业史》经典化历程

文本成为经典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按照Itamar Even-Zohar的观点，“‘经典化’（Canonized）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1]。斯蒂文·托托西说：“我们应该对经典形成的运作性和功能性因素加以注意，即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2]我们现在就从出版、评论、文学史等方面来考察《创业史》是如何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的。

[1] [加]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2] [加]斯蒂文·托托西讲演，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44页。

一、经典的摇篮：《创业史》的出版

作品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被发表被读者所阅读、传播，而文学杂志的发表和出版社的出版正是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为其能成为经典铺平了道路。而不同级别与不同职业声望的文学载体则直接影响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正如洪子诚所说：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经典性程度是有区别的。^[3]另外，在不同层次的文学媒介上的刊载与出版本身就是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裁定。《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也遵循这一文学规律。

《创业史》第一部初次发表的刊物级别并不高。其以《稻地风波》的标题在《延河》杂志1959年4月号上连载，连载几期后，改名为《创业史》，于11月号载完。《延河》杂志是综合性文学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西北大区作家组织）主办，后改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主办。其于1956年3月创刊，在“稿约”中要求体裁是诗歌、小说、散文、特写、政论、杂文、论文与随笔等等，在《火花》1956年12期刊登封底广告，称“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从来稿的体裁要求和隐含读者的想象来看，《延河》重在纯文学趣味与知识分子品味。这时期曾刊登过长篇小说《红岩》、《红日》，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百合花》、《新结识的伙伴》等等也证明了这点。这就不难理解《延河》在五六十年代曾被雅称为“小《人民文学》”，是影响较大的省级刊物。而柳青本人曾是《延河》的创办者和主编，将自己的作品交放在刚刚创刊不久的《延河》出版也是对其成长壮大的一种支持。

[3]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1959年《收获》杂志（双月刊）第6期全载《创业史》第一部是对其文学成就的重要肯定。《收获》是大型文学双月刊，1957年7月创刊于上海。《收获》的办刊风格重在文学品格，是当时少有的不刊登政治性文艺论文，也无趋时应势的种种表态性文章，只有简单的目录与庄重、大方的作品的文学期刊。这与靳以、巴金两位主编关系甚大。靳以是著名的作家、编辑家，在1957年受中国作协书记处委托，与巴金共同主编《收获》杂志，二人都非共产党员。《收获》编辑部甚至是靳以本人组织，党组织未作介入。这使得《收获》杂志具有相对的文学独立性，并类似同人刊物。周扬在1957年5月13日中国作协编辑工作整风会议上，公开说：“如果办成圈子比较小的同人刊物，当然也可以，像现在的《诗刊》和将要在上海出版的《收获》，就都是同人刊物。”^[4]所以，当时文艺界颇为艳羡《收获》获得“特别豁免权”，《人民文学》主编杜黎均在《收获》创刊号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就将《收获》可以“自由刊登作品、发表意见”视为“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的例子予以赞美。^[5]的确，《收获》的主编靳以的编辑理念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密切相连，“（他们）认真严肃，诚恳谦虚，尊重作家的劳动，重视作品的成就，看到一部好作品，如获至宝，像自己创作的一样喜爱，高兴有了新的收获，绝不随便取舍作品，没有仔细认真读完作品以前，也不妄下断语。对作品要求，不论新老作家，不论和编者关系亲疏，一视同仁。即使名家作品，如思想内容有毛病不宜发表，靳以和以群都亲自写信给作家，诚恳而又热情提出中肯意见，建议暂勿发表，待修改或改写后发表”^[6]。所以其

[4] 周扬：《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几个问题》，载《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6] 周而复：《收获三十年——兼怀靳以、以群》，《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创刊号就发表了老舍《茶馆》，发行了6万多份。此后还相继发表了《大波》《乘风破浪》《平原枪声》《迎春花》《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蔡文姬》《林则徐》《不夜城》等小说、剧本，其级别及声望远高于《延河》。

《收获》的“五四”文学气息从其被停刊也可以看出。其办刊风格使得政治色彩浓厚的作协并不满意。1960年，《收获》正式停刊。巴金后来回忆说：“《收获》出满三年，中国作协派人来商量停刊的事，说是纸张缺乏，我感到意外，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也无话可说，”“想想，我有些难过。”^[7]《收获》编辑彭新琪曾谈到：“停刊”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办不下去了，加上作协本来就对《收获》有看法”^[8]。这也正证明了《收获》在1950年代的文学品味和编辑风格。而《创业史》能在《收获》上发表，正体现了其受到巴金等人的瞩目和肯定。

《人民文学》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对柳青的支持更非同小可。柳青的《铜墙铁壁》曾全载于其1951年第1期；并分别刊载过其文论性文章，选载过《创业史》的章节。例如1952年第6期刊载其《和人民一道前进》，1954年第10期刊载其《人民要前进》，1955年总第74期刊载其《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1960年第2期刊载其《永远听党的话》，1963年第12期选载《创业史》（第一部）中的《蛤蟆滩的喜剧》，1978年选载《创业史》（第二部）中的第四章。

随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节节攀升，1960年6月《创业史》（第一部）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出版之时尽管柳青自己不同意还是出版了少量的布面烫金的精装本^[9]，以后依次以连载和单行本的

[7] 巴金：《收获创刊30年》，《再思录》（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蔡兴水整理：《关于收获的一组谈话》，《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1期。

[9] 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邵持文：《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形式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1977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版意味着《创业史》在艺术成就和政治性两方面得到了当时文坛的首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出版社存在国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并存的局面。但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私营书局全部被关、停、并、转，出版业彻底国有化。于是，在出版社国有体制下，出版社一方面呈中央级和省级的金字塔式构架模式，另一方面又按学科分为专业性出版社。而当时中央级专业文学出版社只有四家，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解放军文艺社（1951）和通俗文艺出版社。此外就是部分出版社设有文艺编辑室。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及各级人民出版社。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成为文学出版的龙头老大。新中国成立之后，柳青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分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者于1951年10月正式出版先后印刷7次，发行70万册。后者也先后于1951年、1958年、1976年13次印刷，发行百万余册。这正证明柳青此时已获得新中国文坛的认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身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种文学级别和文学成就的认定。

但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却是1960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初称“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月。1952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建议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1953年4月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正式合并，组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0]从此直属共青团中央领导，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重要机构之一。它所出版的刊物、杂志、书籍都要与党的文

[10] 黄伊：《编辑的故事》，金城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艺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生动体现与展示，并且要对全国的出版工作起一种指导、示范、榜样的作用。

而合并前的开明书店，1926年成立于上海，在现代文学时期就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出版社，对现代国语的普及和新文学经典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从1926年在上海成立到1953年被合并，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大批现代文学优秀作品，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灭亡》《新生》，茅盾的《蚀》三部曲、《子夜》《清明前后》，废名的《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月下小景》《湘行散记》，叶圣陶的《倪焕之》《未厌居习作》，端木麒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钱钟书的《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芦焚的《落日光》《无望村的馆主》《江湖集》《看人集》，俞平伯的《燕知草》《杂拌儿》，周作人的《谈龙集》《看云集》，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朱自清的《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梁遇春的《泪与笑》，臧克家的《烙印》，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汪静之的《寂寞的国》，王统照的《欧游散记》，鲁彦的《王鲁彦散文集》，蹇先艾的《城下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嫦娥奔月》《捉鬼传》等。另外朱光潜的《谈文学》，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文艺书简》，钱钟书的《谈艺录》等文学研究著作，也由开明书店出版。^[11]可见开明书店将给新组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带来更多业务上的指导。

在《创业史》出版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译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出版方针。这个方

[11] 叶炯：《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1期。